

三地紀錄片軌跡系列一

香港紀錄片自由下的掙扎

回顧今年，香港紀錄片依然在夾縫中求存，參與拍攝的年輕人不少，但社會支持不多；台灣紀錄片稍為好一點，「文化部」明年起推動「5年5億紀錄片計劃」，扶助台灣紀錄片發展；內地主要放映紀錄片的四大影展因為種種原因而停掉，發展堪虞。

兩岸三地紀錄片發展面對不同的挑戰，香港在相對自由的創作環境下，有一批人默默地努力，然而現實環境始終不如人意，到底香港紀錄片的機遇與困難是甚麼？能否在夾縫裡開花？

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伍麗微

紀錄片在香港一直處於邊緣的位置，鮮有機會於院線播放，近年稍為成功的例子僅有《音樂人生》，和去年年底上映的《三生三世菩提華苓》。後者雖然口碑不俗，但導演陳安琪事後表示，電影不只能回本，票房與戲院攤分後，還要補貼十多萬宣傳費。紀錄片不受重視至此，實在很悲哀。



紀錄片記下社會真的一面，有助我們了解各人的生活方式和不同的社會議題。

林偉鴻：最大問題缺少放映場地

任何藝術形式，都需要空間展示。紀錄片作為電影的其中一個種類，卻很難以正常的方式（院線放映）與觀眾見面，僅能依賴政府場地與藝術中心的電影院放映，這樣，一方面難以培養觀眾，另一方面對導演而言，作品不能在主流戲院上映，難以回本，也打擊他們的創作慾望。采風電影節目統籌林偉鴻表示，近幾年放映場地愈來愈難找，主流戲院幾乎都不放紀錄片，背後的原因當然離不開錢。



林偉鴻 伍麗微攝

發行商卻步

「早年，戲院覺得片子不錯的話，會讓你放十幾場，然後票房五五分帳，只要努力做宣傳，最後有機會賺幾萬元；近幾年，放映方式改變了，他們要你包場，譬如，戲院會給你一個折扣價，你要出錢買起所有座位，這樣很難做。」片主即使對影片很有信心，可以場場滿座，但扣除給戲院的帳目後，賺得很少。相比其他沒有機會放映的電影，《三生三世菩提華苓》已經有機會在院線上映，入座率也相當高，但最後還是要陳安琪自己掏荷包付宣傳費。

「發行商覺得香港觀眾沒有看紀錄片的習慣，我們覺得你不推廣怎麼會有觀眾？」這是雞和蛋哪個先出現的問題，站在發行商的立場，當然是做主流的劇情片會比較容易賺錢。

「表面上台灣好很多，每年有十多部紀錄片可以在商業院線放映，全台灣有五至八間戲院播放，雖然不多，但起碼有機會放。」因而有去年《不老騎士》超過三千萬台幣的票房奇蹟，今年《一首搖滾上月球》的叫好叫座。「一般來說，在台灣院線上映的紀錄片大概可以有300萬台幣票房，扣除製作、宣傳費後，導演也賺不了甚麼，只是下部戲找資金會比較容易。」但香港沒有這樣的機會。

場地設施不夠

上不了院線，退而求其次，只能利用政府場地和Art Centre放映，只是，政府場地設備不完善，Art Centre的戲院也不能用作長期放映。「政府的場地不是正規的放映院，是多用途場地，裡面有很好的音響、屏幕，但沒有播放器材。」林偉鴻無奈地說，中港台影片的播放格式都不一樣，因而需要的播放器也不一樣，台灣有些片子用了很新的格式，那個播放器要幾十萬，每次排片播放時都很頭痛。Art Centre因為是正規放映院，設備齊全，所有格式片子都能放，「比較好一點。」

場地以外，缺乏資金也是一個挑戰。紀錄片拍攝時間少則兩三星期，長的動輒幾年，張經緯的《音樂人生》花了六年時間追蹤拍攝，黃嘉俊的《一首搖滾上月球》也用了六年時間，導演如果不接其他工作，如何生存？

黑奴血淚史

文：余綺平

黑奴血淚史

一百六十年前，一本描寫黑奴辛酸淚的回憶錄，曾經震驚美國，觸發了美國內戰。此書《為奴十二年》(12 Year a Slave)如今拍成電影，是本屆奧斯卡最佳電影的熱門之選。

回憶錄裡，二十三歲女黑奴佩絲非常勤快，由早幹到晚，每日採摘棉花逾五百磅，比起其他黑奴多三五百磅，成績冠蓋路易士安納州。但佩絲的日子卻生不如死，經常遭奴隸主強姦。女主人洞悉後妒火中燒，愈加虐待她憤憤。

某日，佩絲在河邊洗衣時失蹤，奴隸主以為她逃走了。兩小時後佩絲回家，原來她去向鄰居索取肥皂洗衣。但奴隸主不由分說，吩咐年約四十歲的男黑奴彼池將佩絲衣服脫光，爬伏地面，四肢分開綁柱，用皮鞭鞭打。

彼池起初猶豫，不忍下手，轉向奴隸主求情。但奴隸主已發狂失去理性，他揚言，如彼池拒絕動手，他會另找奴隸打佩絲再打彼池。別無選擇下，彼池揮鞭打了三十下，佩絲的背部血肉模糊。奴隸主認為彼池沒盡力，他搶過皮鞭再狂抽十五下，佩絲體無完膚。

佩絲死裡逃生，從此變得鬱鬱寡歡。「她美好的青春年華亦隨之埋葬了。」《為奴十二年》的作者諾瑟普(Solomon Northup)在回憶錄說。諾瑟普正是當年被迫揮鞭向佩絲下毒手的黑奴彼池。

這宗發生於一八五零年慘絕人寰的虐奴事件，在今天看來，似乎令人難以相信。事實上，這在當年屬於極之普遍的事。諾瑟普三年後逃出魔掌，寫成《為奴十二年》一書。美國歷史學家認為，此書觸發南北戰爭，導致林肯總統率軍解放黑奴。

諾瑟普一八零八年於紐約出生，本屬自由身，隨父務農，有機會上學讀書和學習拉小提琴。他二十九歲結婚，育有三子女，生活僅可糊口。三十三歲卻遇到厄運：兩名騙子詭稱馬戲團招聘小提琴手，帶領諾瑟普去應徵。結果諾瑟普遭綁架，被鐵鏈鎖上賣到南方的紐奧良，再輾轉在當地的奴隸市場被拍賣。最後，他以一千美元被賣到路易士安納州，與佩絲共事一主。他曾經多次反抗及逃走，遭奴隸主鞭打至皮開肉裂後，四肢被牢鎖，在猛烈的陽光



下曝曬，以示懲罰。諾瑟普在農場採棉花斬竹蔗，披星戴月地辛勞工作。據《為奴十二年》講述，曾經有一黑奴企圖逃走，遭主人放十頭惡犬狂追。該黑奴最後被分屍，遭餓犬食剩屍骨。

諾瑟普後來認識一加拿大木匠，在他的幫助下，諾瑟普向法院申訴，證實自己本是自由身，遭綁架販賣。法庭判決，將諾瑟普釋放。為奴十二年，諾瑟普終於返家，妻兒無恙。在爭取黑人權益組織的支持下，他於一八五三年寫成《為奴十二年》一書，書中內容震驚美國人民。

一百六十年後的今天，《為奴十二年》被改編拍成電影，由得獎的英國大導演史提夫·麥昆(Steve McQueen)執導。此片排期於今年十二月十八日在美國上映，影評人觀後一致讚賞，認為有機會奪得本屆奧斯卡最佳影片大獎。

張虹：審慎樂觀看待紀錄片發展

「紀錄片其實是可以賺大錢的，因為成本低，拍到《音樂人生》這種程度已經可以賺錢，絕對博得過。」資深紀錄片導演張虹笑說。紀錄片的成本比劇情片低很多，劇情片「閒閒地要五六百萬才能拍」，紀錄片只要八九十萬就可以拍得很好。但無論是政府、電影發展局，還是發行商都看不到當中的利潤。



紀錄片導演張虹

社會的事，因為拍紀錄片是一個很好的經驗去了解社會，「你可以自由創作，觀眾看了又有啟發。」

香港有人才

香港目前來說，是拍的人比例上偏少，片子的種類也不夠。「我們的深度不夠，內

起碼可以維持生計

拍紀錄片的人都不是想着要賺大錢，但香港目前的狀態是拍紀錄片難以謀生。張虹是全職紀錄片導演，拍了多部紀錄片，手上還有四部片正在剪輯中，她坦言，在香港拍紀錄片很困難，但不是沒有機會，重點是你願不願意「捱」。「我做了這麼多年都死不了，」她把生活要求降到最低，日子過得簡樸一點，身兼其他工作，一樣活得很好，但這不是一個良好的生態。「我們起碼要做到拍出來可以維持生計，這才會有人拍，這個情況是可以改善的，香港好歹是個有錢的社會嘛。」

地片又深又闊，像《三峽啊》，很深入地講三峽工程的來龍去脈，香港真的沒辦法，題材不夠其他地方多，但我們的創作自由比較大，應該可以做多一點。」近幾年，大專院校開始鼓勵學生拍紀錄片，應亮在香港演藝學院推動學生去拍，中大、公開大學也有相關的課程，學生即使以後未必會拍紀錄片，但學會怎麼拍也是好事。「這裡沒有沃土，但有空氣有陽光，香港政府不干涉你但也不太幫你，你必須自己掙扎，有韌力的話，就像街邊的小草，可以在夾縫裡生長，我們的情況就是這樣。」

對於香港紀錄片的前景，她以「審慎樂觀」的態度看待，「樂觀於有人才，但客觀環境不好。」惟有慢慢推動，讓知識普及，希望人們有一天會知道：啊，原來紀錄片是這樣的，不是像Discovery Channel那樣只講旅遊、飲食食等話題。

始終這裡不是溫室，種子要生存並不容易，慢慢來吧。



香港演藝學院學生執導的短片《遠航》。



香港紀錄片發展雖然不明朗，但張虹喜見愈來愈多年輕人對拍紀錄片有興趣。

草間彌生首次中國個展 下月登陸上海

當代藝術「前衛女王」草間彌生下月將在上海舉辦中國首次大型個展。本次展覽將會展出一百多件作品，除了草間彌生標誌性的黃色南瓜、圓點花紋等被大眾熟知的作品之外，還將展出藝術家近年來的最新創作。

中國站為草間彌生「我的一個夢」亞洲巡展的第二站，首站於韓國大邱市立美術館展出。中國站之後，「我的一個夢」預計還將在其他亞洲城市巡迴展覽。中國站的地點定於上海當代藝術館，展期為2013年12月15日至2014年3月30日。上海當代藝術館透露，本次展覽將展出不同形式和題材的作品，包括大尺幅的裝置、繪畫、雕塑和視頻，旨在向中國觀眾完整地展現草間彌生獨特的藝術風格。

享譽世界的日本藝術家草間彌生在當代藝術圈內獲得高度評價，她的作品也為觀眾認同，並被世界100多所美術館收藏。1929年生於大阪的草間彌生於1960年代在紐約成名。1973年她返回日本，因患精神病住進精神病院。如今草間彌生已經年逾80，是身價最高的藝術家之一，目前仍持續創作。



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章蘿蘭